

京華待思錄

序

京華待思錄

陳麟

在南京城市规划专家咨询论证会上的发言·····	(一三三)
关于西安市两项规划方案的评议·····	(一三八)
在湖北省沙市市总体规划评议会上的发言·····	(一四二)
建设台州市要做好规划工作·····	(一四九)
关于城市规划理论研究	
《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商榷	
·····	
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	陈干 高汉(一五一)
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	陈干 高汉(一七二)
忆陈干	高汉 陈干(一九四)
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段·····	高汉(二一五)
陈干传略·····	董光器(二四四)
陈干简历·····	董光器(二五零)
编后记·····	高汉(二五二)

目 录

痛悼我的老战友——陈千同志·····	郑天翔(一)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四十年·····	(九)
北京城市的布局 and 分散集团式的由来·····	(三四)
如何看建国十七年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	(五五)
住宅类型 and 标准问题初探·····	(七零)
在日本东京「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附英文)·····	(九一)
古都风貌 现代城市·····	(一零一)
以最高标准实事求是地规划和建设首都·····	(一零九)
关于北京地区卫星城镇建设的若干问题·····	(一一六)
我所了解的刘仁同志有关规划工作的重要指示·····	(一二零)
一个关于浪费用地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一二五)
其他城市规划意见·····	(一二五)
关于上海城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评价·····	(一二五)

痛悼我的老战友

——陈干同志

□郑天翔

我怎么也想不到陈干同志会先我而去。我总觉得他比我年轻得多，谈起话来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想不到1994年11月3日那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倾谈！那一次他来，说：“前些年得了心脏病，发过两次病，都没在乎，今年夏天是第三次发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完全稳定了才出院的。”我问他：“你现在感觉怎样？”陈干说：“很好。”于是，我也就没有再仔细观察他的身体状况，便谈起话来。而一旦谈起来，陈干简直是又讲又画，滔滔不绝，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我也忘记了他是个病人。陈干说，听到一些情况，心里很憋气，早就想说一说心里的话。

近年来，在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怪物。陈干同志感到憋气的所谓“东方广场”，就是一种怪物。它是一个庞大建筑，建筑四周并没有广场，而忝然命之曰“广场”。还有，北京城里城外，出现了许多“城”，几间房子就可以叫一座“城”，无奇不有。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移植来的“文化”。当然，使陈干同志憋气的主要的还不是那“广场”二字。这个“广场”叫做“集商业、办

公、文化、娱乐等设施为一体”。陈干同志指着 he 找来的图纸，边说边解释。他说：“这个巨大的火柴盒，东起东单路口，西到王府井路口，长几百米，高度达 80 米，超过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倍。它比天安门广场建筑群高出一倍，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及故宫等等，简直成了陪衬它的盆景。”我说：“你听到大家有什么意见？”陈干说：“先前我在医院，不知道。出院后听到种种议论。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建设部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各方面的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我问：“那为什么就干了起来呢？”陈干一脸愤慨而又深沉地说：“陈希同搞专制，一言堂，不让人说话！”陈干又在图纸上指了指，再次给我讲了那个“火柴盒”丑陋而又有害的状况，生气地说：“就是这一个又蠢又不协调的设计，陈希同也不许说一个不字！我听几位同志说，陈希同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看这个方案，当着外商的面，他竟说，谁也不许提反对性意见。谁要是提了，谁就是没本事，谁就辞职。他甚至当众对外商说，他同意了，就算定了。”陈干怒不可遏，连声说：“多么专横！多么无耻！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接着，陈干同志又给我讲了一个“可悲的笑话”。讲完后，他说：“我听到这事，都觉得脸上发烧。”陈干，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堂堂正正、浩气凛然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看着那种丑态，那种丧失国格人格的丑态，而不气愤，不觉得“脸上发烧”呢！他为党的事业，为首都的建设，憋了好多气，他带着激动的神情说：“很多同志早就对陈希同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上的霸道和瞎指挥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这次的‘东方广场’事件，冲突就更突出了。当然，也有个别人跟着他们跑的，但只是个别的。报纸上披露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即将拆除的事后，引起全国的关注。但他们还是加紧

开工了。”陈干愤愤地指着陈希同“我同意就算定了”的、不准人提不同意见的那个方案说：“新华书店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这个图上作为附属建筑摆上，而且，建筑面积很小。”他愤愤不平，“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的新华书店！怎么能这样对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说：“那也是国家剧院啊！”这一谈，就是将近两个小时，陈干毫无倦容。临行时，说要写意见书。我说，可以告诉其他同志，把情况详细整理一下，我也看看。

陈干同志回去过了两天，打电话说，已告诉一位同志整理材料。没想到，再过不久，张其锬同志就传来陈干同志逝世的噩耗。

陈干终生献身于首都城市规划建设，他热爱首都，热爱祖国，热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为国家建设的日新月异而兴高采烈。他也为党内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忧思如焚，更为首都建设中一些专横霸道的东西、瞎指挥的东西，把规划一脚踢开、把原则拿出来做交易的东西着急。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陈希同执意要搞的丑陋愚蠢的“东方广场”，深深地刺痛了他。

这些年来，我和陈干同志都从第一线退下来了，我们有可能多聊天了。陈干每次来，我们都聊个没完。没有固定的题目，所见所闻，所思所虑，想到哪里就说到那里。聊的最多的还是有关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关于北京建设的事情。

1949年，北京解放不久，陈干同志北上，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首都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从1953年起我们共事，参加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工作。尽管我是外行，我还是同陈干和其他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和技术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随着首都城市建设大规模地展开,一批又一批城市规划专家锻炼成长起来。陈干同志是北京最早的城市规划专家之一。他从头到尾直接进行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多次的修订工作。他勤于动手,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再加上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历史知识,在实践磨练中逐步成长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城市规划专家。全国许多城市的规划工作,他参与过;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建设,他考察过。因而,每次来谈总是使我获益。

陈干同志和我谈论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城市究竟怎样建设的问题。很显然,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有明显的共性。然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有没有自己的个性?在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时,当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的经验。这是明显的、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要照搬西方城市的模式?什么叫现代化大都市?纽约是现代化大都市,东京是现代化大都市,香港也是现代化大都市。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北京,是不是要照抄这些大都市,要把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复制过来?陈干说,他仔细观察过,高楼上那种大疙瘩(指旋转厅),北京比东京还多。他举了这样具体事例来说明模仿性之大。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常听人说:“国外就是这么办的。”国外怎么办,我们就盲目地照办,这就叫现代化?城市建设是复杂的工程,它既反映生产力,也反映生产关系;既反映经济基础,也反映上层建筑。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既要遵循现代化城市的一般规律,也

要遵循社会主义城市的特殊规律,更要遵循首都的特殊规律。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我国城市建设专家亟待共同研究、探讨的课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持久地、大规模地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学已在形成中,可能有的专家已有专著。我曾多次建议陈干同志写一本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书。他说,准备写北京城市规划史。从历史事实出发,总结极其丰富的实际经验,探索首都北京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陈干同志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

在城市建设中,为什么人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特殊的人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社会主义首都城市建设的特征,表现在北京的城市建设总方针上,就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归根到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旧北京保存了大量封建时代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和技术光辉灿烂的遗产。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珍宝,是中华民族卓越才能的见证。然而,旧北京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也不适应为中央、为人民、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保护北京的历史文物和文化设施。1949年1月16日,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没有攻城,北京和平解放。这样,故宫和其他著名的文化古迹及大学统统保存下来。我们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任务,一方面要保护北京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还要把

旧北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北京。要把一个为封建帝王将相及其仆从服务，后来又为殖民主义者官僚、军阀、资本家及其仆从服务的腐朽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朝气蓬勃的生产城市，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城市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城市。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伟大首都完成了这两大转变。陈干同志和他的同事们，在总体规划工作中具体地体现了这个历史的转变。在制定规划和实际操作中，我们有过一些失误，有的及时改正了，有的则事过才发觉。在十年动乱中，北京的总体规划和文化古迹遭到浩劫。然而，毕竟历史性的转变是实现了。

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是综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体育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于一体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把伟大首都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城市。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革命精神。它贯穿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贯穿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全部领域，当然，也贯彻于首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之中。北京的城市建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向世界上一切城市建设的优秀成果学习，向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建设中好的、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学习，我们从来就好学不厌，不排斥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经验。然而，我们是独立自主地分析精华和糟粕，独立自主地决定取舍与去留，走自己的路。我们的立脚点不是照抄，不是模仿，而是创作，是创造。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城市建设的构想、方案、艺术和技术，至今为世人所景慕。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什么就不能创造出无愧于先人与后世的

城市建设经验呢？建国 47 年，首都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个历史性大变化，城市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设施的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城市建房以每年千万平方米以上的规模进行，市政设施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北京的面貌日新月异，国人振奋，世界瞩目。1956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北京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工作，临行时说：“这个规划示意图应该叫快意图，这个室叫‘快意室’。”看到“快意图”的许多部分由纸上搬到地上，我们从“快意室”过来的人能不兴高采烈！然而，也有令人不快意的事情。既然是首都，是政治中心，那么处理首都建设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讲政治，就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前面提到的“东方广场”，就是一个同政治中心极不相容的东西。试想，当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都没有在人民共和国第一街——东西长安街上得到应有的位置时，那样丑陋愚蠢的“一体”有什么资格屹立于长安街上？而且占领长安街几百米长、几十米宽的地带，要以其庞大的块头凌驾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之上！何况，那样的“一体”在这个地区已经不少。而事情并不止此。东单公园也叫庞然大物占领了。东单公园是北京旧城内唯一的一块大空地，位居要冲，建国以来，一直保留了 40 多年。不是没有人想在这里进行建筑，只是因为它是公共绿地，是为附近的公众和学生服务的，就保留下来了，整整保留了 40 多年。怎么忽然间就高楼矗起来了？岂止如此！看一看北京城的其他地方及市区周围，有多少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有多少景色秀丽的胜地不受切削和侵犯？一些房地产资本，甚至是空头资本，以最大限度地追求最大利润的欲望；在不少场合，在不同程度上，事实上主宰着北京的一些城市建

设。它们占街、占道、占山、占水、占学校、占体育场，眼睛里哪有什么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哪里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陈干同志曾经自豪地对我说，他接待过欧洲某大国的城市建设代表团。他们看到北京市区内的公园、绿地那么多，赞不绝口，并自认弗如。陈干常常以北京的河湖水系、公园、森林、绿化自豪，以它们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而自豪。他说，这在大城市里是少有的，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为了这个特色，陈干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跋山涉水，调查勘探，在1953年就提出了“引潮白河水入京”的引水意见；在1956年就具体确定了密云水库的位置和引水入城的路线。陈干同志和李准、沈其等同志顶着“大绿地主义”的帽子，为规划首都北京的分散集团式布局和园林化，达到不眠不休的地步。他认为从城市布局上看，分散集团化和园林化是最优越、最有中国特色、最具有民族风格的布局。当他看到北京滚雪球式地往前滚，总体规划已经被置之脑后时，他茫然若失，忧思绵绵。当拜金主义借着现代化的名义盛行时，他的忧思与日俱增。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方向，确实是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陈干同志正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然而，他匆匆促促地逝去，去得那么仓促！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有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丰富经验。我们应该把经验总结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科学。陈干同志有志于此，也有能力探索这样的科学。壮志未酬，给我们留下深深的痛楚和遗憾！

1996年7月17日

北京城市的布局 和分散集团式的由来

—

城市的布局是城市的战略部署问题，当然是城市规划的根本问题，也是市政建设中每天都要碰到的重大实际问题。从我们进北京城的那天起，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在此后的 10 年中，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旧城的改建首先要涉及到的，就是整个城市的布局，因此同样是战略部署问题，也同样是城市规划的根本问题。它不但是每天都会碰到的重大实际问题，而且还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

不过，城市的布局虽然是城市规划的根本问题，但并不是城市的根本问题。城市的根本问题是城市的性质和规模。对于北京来说，我们无需首先讨论这两点，因为：

第一，它是我国首都的性质，早已由宪法规定了。

第二，它正在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前进，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

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北京是社会主义城市，这也早已由宪法规定了。

第四,在规划市区内^①,经过 1958 年大跃进,已摆满了工厂。今后不可能再摆新的工厂,除非作出必要的调整。因此,市区规划的主要问题,已不是根据多大的规模来进行布局,而是怎样布局才最合理;其表现形式是考虑市区内各单位,哪些应保证其发展,哪些应限制其发展,哪些则必须加以调整的问题。

第五,存在庞大的改造旧城的任务。一方面,北京是世界知名的古都;另一方面,新生活 and 旧城市的矛盾每天到处都在发生,不重新部署,矛盾很难解决。

以上五点是规划北京这个城市时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城市规划工作的根据,并表明北京现阶段城市规划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布局问题,其中尤以旧城改建问题为重要。

二

决定城市布局的因素虽然很复杂,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城市的性质和规模。就这两者而言,性质比较容易确定;规模往往不容易确定。城市越大,规模就越难定。如果又涉及旧城的改建,情况就更加复杂,规模也就更加难定。当规模还处于不定之中,而城市的建设却不会因此而稍事停息。这时,建设的速度越快、数量越大,城市规划工作的难度就越大。要做规划的话,往往缺乏依据;不做规划的话,城市正在发展,不能放任自流。这就是多年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城

^① 我们常把东到定福庄,西到永定河,北到清河镇,南到南苑这个区域称为规划市区。以下同此。

市迅猛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令人兴奋,使一个城市规划工作者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全部热情;但另一方面,它又让你惊恐不安,仿佛骑着一匹烈马,在原野上奔驰,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这就是城市规划工作者每天都要面对的严酷现实,也是一个必须去解决的严重问题。

这样的意见肯定是不对的:既然城市规模没有定,规划就没法做。抱着这种看法的人,只承认规模对布局的决定作用,不承认布局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他们抱怨多于进取,成天跟在车子后面,埋怨车子跑得太快,不去积极研究有关规模的问题,在寻找可能的布局形式上放弃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企图躲开现实矛盾,置身事外,或者“站着说话不腰痛”,充当“事后诸葛亮”,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工作中的惰性力量。

同样,这样的观点也是不对的:以为城市的规模既然定不了,或者定下来了,但不久又被现实冲破,因此就根本不去想它,不去管它,只顾自己埋头进行布局设计。这是思想上的片面性导致工作上的盲目性,工作虽然做了,有时还很辛苦,但成效不大,损失不小。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布局固然受城市性质和规模决定,但布局也不是完全不能影响规模的。在性质已定、规模未定的情况下,寻求适当的布局为城市的可能发展留出合理的余地,未必不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就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分散集团式的布局方式。

具体说来,它是这样的:北京规划市区的城市布局,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形成以旧城为中心区的大格局。新建地区工

厂、仓库和工作居住区等，按照具体条件，单一地或综合地形成一个个集团，环绕着中心区发展；如果把中心区视为一个最大的集团，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那么以道路、河道和铁路就可以把各个集团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其间以大片绿地使它们彼此有所分隔。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既有联系又互相分隔、既集中又分散的布局。所有集团的总和构成规划市区的全局。一个集团是一个局部，就这一个集团而言，它又是一个小的全局。以工作居住区为例，一个居住小区，又是这个工作居住区的一个局部。因此，每个集团在一定范围之内可大可小。每个集团既然有相对的独立性，那么就整个规划市区来说，集团的个数也就可多可少。

这种城市布局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从它的发展进程和形式演变来说，完全是历史形成的。解放初，北京“地广人稀”。但新建筑发展很快，而且每个单位的建筑用地一般都是宽占窄用，因此从全局来看，城市展开的局面比较分散。在1954年，大约有45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建筑分散在城外的广大地区内。当时相对目前来说，建房的单位要少得多；各单位的人员也要少得多；那时的经费和建筑要求和现在也大不相同；城市的管理水平跟现在比当然更不一样。这种种原因使后来的市政建设不得不就着这种局面分散地进行。我们就是面对着这种分散的局面开始规划工作的。最初采取是紧凑发展的方针，把若干零散地区先连成一片，使它们形成新的街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便于添补必要的福利和市政设施，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发挥已有的福利和市政设施的作用。这就是分散集团式布局最初的萌芽和起因。

从城市的客观条件来分析，形成这种萌芽完全出于发展

的必然。首先，它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形式。北京是个大城市，规划市区的幅员约 640 多平方公里。虽说是一个城市，由于范围广大，各个局部的自然条件，例如，地形、地质、水文等等就难免有差别，有的差别还很大，有山地、有平地、有河道、有沼泽；北京又是一个古城，近郊地形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为破坏很严重，深沟纵横交错，窑坑遍地可见，荒坟累累，渚水漫漶。再加上几百年的老菜地要保留，许多村庄不是说迁就能迁得走的。这种种自然和历史形成的条件，使城市的发展不得不采取分散成团的方式，而不可能像在一片白纸上画画似的，一开始就大片大片地按主观规划建设。

从城市规划的需求来说，形成这种格局也是有根据的。大城市的工业区要分散布置，如果过于集中就难免造成日后交通运输过于拥挤的局面。这样就必然地要使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相对地增大距离，仓库区的情形也一样。因此采取分散集团式也是合理规划的一种必需手段。

· 根据上述种种情形，我们逐渐摸到了分散集团式布局这条原则的边缘。在此后的实践中，我们又有意识地加以总结和提高，终于确定了这条原则，就被命名为分散集团式布局模式。

三

事实证明，运用这种模式进行城市布局有许多优点。北京的城市规模，开始估计为 500 万人，控制数是 600 万。但在实践中，这并非北京城市规模的定局，历年来均有变动。这种变动来自国家形势的发展，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是当时的城市规划工作者所能左右得了的。由于我们采取了